

敦煌与故宫

——不同力量铸就的文化丰碑

王旭东

王旭东

故宫博物院院长，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二十八年敦煌的经历、一年半故宫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我人生的影响，让我产生的感悟。

特别幸运，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我能与这两座文化丰碑近距离接触并接受熏陶。这样的环境实际上改变了我这样一个来自西北山村的孩子。

在敦煌待了二十八年之后，当我走进故宫，另一个文化的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但是在这个世界里，我到今天还是一个追随者。我会继续与这座文化殿堂共处，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不同的文化殿堂带给我们的影响，以及我们对这两座丰碑的敬畏。

我是在兰州大学读的本科、硕士，最后在职读博士，一路都是学地质工程。我是一个文物保护工作者，不是一个文化艺术学者。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文化中有所得，所有优秀的文化都会改变我们。敦煌、故宫这两座文化的丰碑，一定会带给我们认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不同视野。

敦煌诞生与丝绸之路

一提到敦煌，我们会想到在中国西部被沙漠包围的那个秘境。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在1700米的崖壁上，开凿有735个洞窟，其中492个洞窟有壁画和彩塑。从公元4世纪一直持续到公元14世纪，整整创建了1000年。

为什么这样一个佛教的保护地会诞生在荒凉的沙漠？我们必须回到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漫长而又艰险，是一条贸易之路、科技传播之路，更重要的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从长安沿着河西走廊，通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路向西，走向南亚、走向中亚、走向西亚、走向地中海。就是这样一条路，在公元前2世纪因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而打通。敦煌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在丝绸之路之上肩负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可以看到，在沙漠戈壁包围中有一片小小的绿洲，它是为东来西往的僧侣、商人和军队提供歇息的场所。

当汉武帝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希望打通与西方世界沟通的路。但是那时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长期侵扰甚至占领河西走廊，汉武帝希望联合长期在河西走廊生活的大月氏民族两面夹击，把匈奴赶出去。当时张骞出使西域，到了现在阿富汗一代，找到了大月氏民族。但人家已经生活得非常好，不愿意再回来。不过张骞发现，在中亚有非常丰富的物产，也有相当发达的文化。虽然军事联盟的初衷没有实现，但是让汉帝国更加坚定了向西进取的决心。所以汉武帝在敦煌设立敦煌郡，修建汉长城。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些挫折其实预示着辉煌。我们也可以看到，汉长城作为一个物理隔挡，形成了当时跟游牧民族的隔离，维持了一种和平共处的状况。所以今天我们在认识长城的时候会看到另外一种意义：我们这个民族从文化基因上是爱好和平的，不是一个侵略的、一味扩张的民族。



一代一代人的长期守护，才使得今天的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真实的故宫。
图片来源：新华社 摄影：金良快

阳关、玉门关，这些我们每个人耳熟能详的名字，铭记着我们这个民族向西进取的决心和向东回望的无限乡愁。我们走出去是为了交流，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直到今天，这样一个民族基因依然存在。当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为了跟我们的周边、跟“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建立一个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

也就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汉武帝在敦煌设立敦煌郡，建立阳关、玉门关，向曾经被游牧民族占领的地方大量移民，把中原的文化带到了敦煌，把科技、水利等农业文明也带到了敦煌。我们中原的文化在这个地方存在了几百年，做好了迎接印度佛教的准备。如果没有这几百年的文化积淀，来自印度的佛教

会一路向东。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自然环境，给敦煌带来了这样的机遇，留下了今天让世人感到震撼的文化遗产。

我们一说到敦煌，就会想到莫高窟。莫高窟持续了1000年的创建过程，确实留给了我们非常丰富的历史记忆。从莫高窟的735个洞窟中，可以看到建筑形式的变化。早期的洞窟延续了印度地区的形式，后来逐渐变得也有中原的风格，它不断在变化。

我们从几千尊彩塑中也能看到佛教造像的演化，以及佛教艺术的中国化和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当我们看到盛唐时精美的佛像，仿佛可以看到大唐的气象。造像的精美，艺术家对阴柔、阳刚的把握，通过造像反映出的佛教思想，都会让我们每个人感受到那种精神力量。当

我们看到中唐时期的释迦牟尼涅槃像时，艺术家呈现出的涅槃的那种美、那种境界，会让每个人都深深震撼。所以我们说，它是最美的涅槃像。

4万多平米的壁画，可以说是敦煌莫高窟最重要的艺术呈现。它记录了不同时代的佛教主题，让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这就是莫高窟的巨大价值所在。

佛教的背后，其实很多是表现生活中的各种场景，所以我们说它是墙壁上的博物馆。比如我们通过乐器的演变，可以看到丝绸之路上的文化的交流。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乐器实际上都来自两河流域，甚至来自埃及，今天变成了我们中国自己的民族乐器。如果没有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我们今天的生是多么单调！这样形象的资料，都画在壁画里。这就是敦煌，一个佛教背景的文化，其背后是佛教进入中国、传播发展，最后中国化的过程。

故宫文化溯源：不一样的推动力

当我去年4月8日来到故宫时，我彻底改变了对故宫的认识。因为过去受到的影响，我们可能会觉得故宫背后是满清的腐败无能，会觉得这里是封建王朝所在。但是当你站在这里，才会发现它是真正的中华五千年文化传承的瑰宝，是一代

又一代的文化积淀筑就的。实际上，紫禁城的肇建并不是距今600年前，我们必须把它追溯到2000年之前，在《周礼·考工记》中已经规定了皇宫的基本情形。直到明代，这样的基本情形也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说中华五千年文明没有中断，是一脉相承的。比如紫禁城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宫、背山向水等等，这都是一代又一代王朝建设都城、建设皇宫的基本情形。这些演变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明代朱棣决定迁都北京，1420年都城建成以后——那个时候还不叫紫禁城——奠定了明朝在农业文明跟游牧文明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带上长期稳定的格局。所以紫禁城的整个建筑形式、规制，包括它的每一座建筑的名称，都是对中华文化的体现。

到了清代，基本上沿用了紫禁城的所有建制，只根据需要做了一些扩展而已。清朝满族统治也继承了汉族文化的正统，否则它不可能统治汉民族两百年。我们走进故宫的时候，每个人看到的先是建筑之美。当你被这种美慢慢吸引住，才会慢慢去了解它承载的文化。在这里，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美。所以在故宫是一个不断发现美的过程。在不同的天气条件下，我们也可以发现这座城与环境的融合。

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建

筑绝大多数都是明清延续下来的，但是名称做了一些改变。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太和殿，在明朝叫奉天殿，后来改称叫皇极殿。这种名称的改变也是对文化的体现。“太和”是要追求最大的和谐，国家和谐、社会和谐。国家要顺应天道、顺应民意，也就是顺应规律，不能逆天而行。满族人走进中原之前就不断学习太和和文化，他是用文化来统治的，所以文化的力量无比巨大。

中和殿，依然是一种“和”文化，中庸的文化、中正的文化，其中匾额“允执厥中”来自《尚书》。保和殿也一样，还是“和”，和平、和谐。

到了后宫，我们看到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这三座宫的名字也是来自《周易》，就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天地交感，最后是和平、安康。当天地交感的时候才和谐。一开始交感是有矛盾、有冲击的，但是到最后会达到平衡。所以很多人说这个社会有矛盾，但没有矛盾的社会是没有生命力的社会，我们要不断在矛盾中去寻求平衡、寻求平和。

交泰殿里有一块“无为”匾，这个作为皇帝的追求是非常了不起的。《周易》里面，“无为”蕴藏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实际上，统治还是要让老百姓最终达到和谐，不去折腾。所以后三宫就是这样一种文化体系。

故宫不仅仅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而且还收藏了今天统计的186多万件各类文物，其中90%都是珍贵文物，一级、二级、三级。这些文物的来源有几个，一个是历代皇家收藏承袭，二是清宫大量征集收藏在民间的文物，还有一个就是宫廷制作。宫廷制作也有生活用品，当时的生活用品今天变成了文物。这些宫廷制作是不同地域的工匠们创造的，还有来自西方的，所以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

还有明清编纂的书籍。只有在皇家力量的支持下，才能成就像《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康熙字典》这样的大作。所以敦煌和故宫这两座文化丰碑，我们可以隐隐看到它们的推动力不一样。

两座文化丰碑: 不同的影响, 不同的视角

回到敦煌，通过那些供养人，通过大量的文献，我们知道它是通过民间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来推动的。在敦煌看不到皇家的影子。通过供养人可以看到这些石窟的开凿背景。而且我们还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早期的供养人像非常小，到了宋代越来越大。原来的供养人像所在洞窟都在不重要的位置，到了晚唐和宋以后，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洞窟。所以随着佛教信仰的不断变化，人性已经慢慢大于神性，也预示着佛教走向衰落，人开始自

大起来，人要留下自己更多的东西。

220窟开凿于初唐，是由建窟家族翟式家族开凿的。这个洞窟从开始开凿到他的后人最后完成，持续了二百多年，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在甬道可以看到，家族的后人为祭奠先祖，在这里画了当时流行的信仰文书。两百多年，那是多少代的传承，就是因为佛教信仰。

而我们看到的紫禁城，它与敦煌的创建完全不一样。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表达的是皇权，是威严，是禁地。这个地方无处不体现正统文化在宫殿建设、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它是国家意志的推动。

在故宫，可以看到“家天下”这样的文化，家就是国，国就是家，这是中国人的家国文化在皇宫里的体现。千里江山图、金瓯永固杯，都是希望国家繁荣、国家稳定、世代相传。

我们从敦煌和故宫也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交流的现象。有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有我们国家内部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之间的交流。敦煌可以说是一个走廊，我们看到的是通道式的文化交流，是联动。今天不同国家的人们来敦煌，都可以找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

我们还能看到不同的民族因为信仰佛教在这个地方开窟造像。比如粟特人，粟特人是一个中亚民族，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实际上就是这个民族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我

们在藏经洞发现的各类文书上，更是记载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还有不同的宗教文献。这告诉我们，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敦煌或者更大的范围，不同的宗教在这个地方能够共生，但是最后成了“佛教一家人”。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为什么它们在同一时间、同一个地方能共生，以及为什么后来佛教会一家独大。它会带给人很多启发。

而故宫同样是多元文化融合的景象。它的多元是我们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在这个地方交流。我们可以在故宫看到不同的宗教，道教、佛教、萨满教。我们也能看到来自西方的文化在一定时期也对它有影响，或者说我们本身也希望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但是我们看到的灵沼轩，清王朝当时已经建不起来。清王朝对西方文明有一定程度的向往，但他并没有把西方的科技文明抓住，才使得清王朝走向衰落。

因为敦煌和故宫这两个文化殿堂独特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在1961年，他们共同成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因为它们独特、突出的普遍价值，在1987年又成为中国的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在敦煌看到的是联动、是变化。在故宫看到的是厚重。这两座文化丰碑带给我们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对它们的认识也需要不同的视角。

敦煌保护：“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化遗产，就会想到对它们的保护。它们的保护依然体现了这样两种力量，非常有意思。我们先看敦煌，道士王圆箓在1900年发现了藏经洞，那时莫高窟是由三批佛教和道教的人管理的，就是民间力量在管理。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让莫高窟重新被世人所关注。

他发现以后，告诉了当地的官员，但官员没人认识到这里的文化价值。那时满清王朝已经奄奄一息，正好是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太后在亡命的时候。据说王道士还给慈禧太后写了一封信，希望交给朝廷，没人理。最后在新疆这一带考古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知道了，他通过各种手段骗走了藏经洞的大量文物，但是他们也留下了一些照片。后来法国的伯希和来了。他是个汉学家，会说汉语，会自己跟王圆箓交流，就可以进洞窟里面去挑，只用了很少的银子就把藏经洞大量的珍贵文物带到了英国、法国、印度。这些探险家留下了大量的图片，让我们得以看到那个时候莫高窟的状况。

再往后，俄国人来了，日本来了，美国人也来了。当美国的华尔纳到敦煌的时候，藏经洞能搬运的文物已经都被瓜分完了，只剩下一部分于1910年送到了北京，今天的国家图书馆。这些残卷原来说是

8000多件，实际整理出来以后是1万多件。当华尔纳发现藏经洞已经没有什么文物可拿的时候，他就开始偷塑像、粘壁画，这种浩劫也是非常让人心痛。那个时候国家在哪里？政府对文化的保护在哪里？

甚至还有这样一个现象，苏联红军把白俄的军队赶到新疆，新疆和甘肃达成协议，将这些白俄残部送到敦煌。这些人在县城要闹事，干脆就关到千佛洞去。他们在洞窟里住了几个月，在那里生火做饭，在壁画上随意刻划，这又是一次浩劫。莫高窟的命运就是这样。

后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张大千1941年到敦煌，在莫高窟前后待了两年零七个月，中间他还到兰州、重庆办画展，还到青海找到喇嘛画师，帮他一起画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民政府检察长于右任来看张大千。当他看到莫高窟的时候，非常震撼。他也看到了莫高窟的破败，回去就商议要向国民政府提案，在敦煌设立敦煌艺术所，招收研究生。可惜那个时候条件太差，这个艺术学院没有建成，最后建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

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宣告成立，第一任所长就是常书鸿先生。他在法国留学十年，可以说在艺术界小有名气。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他在巴黎塞纳河边的一个书摊上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很惊讶在中国的西北



工作人员对莫高窟部分洞窟进行加固施工（1964年7月8日摄）。

图片来源：新华社（敦煌研究院提供） 摄影：陈斌

还有这样了不起的艺术。他说我将来有一天一定到那去看一看。

后来他回国先在教育部任职，然后在国立艺专任职。在教育部，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成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组的主要负责人。敦煌距离兰州有近1100公里，他把夫人、女儿全都带去了敦煌。他女儿常沙娜是我们清华美院的前身中央工艺美院的老院长。敦煌实在是太苦了，常先生的第一任夫人实在受不了，后来离他而去。受不了可能有很多原因，第一，生活太艰苦；第二，

常先生对她照顾不够，整天都扑在工作上；第三，可能有信仰的关系。她是个天主教信徒，但整天面对的都是佛教雕塑，于是后来就走了。这也是很悲凉的一个故事。一说到这，很多人都潸然泪下。但是这种情况下常先生仍然坚持留下来，非常了不起。抗战胜利后，曾经跟他来的那些年轻画家也都走了，就留下他一个光杆司令。他就告诉当地的两个工友，说你们看着，我再去找人，一年以后回来。这两个工友不相信他。没想到，一年后他真回

来了，而且还带来了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先生。段先生也是因为看了张大千的画展，对敦煌充满了期盼。

这两位先生把一生都献给了敦煌。再之后，一批又一批的年轻艺术家到了敦煌，漂亮的女士们到那里过了几年以后都像农民一样。虽然环境改变了她们的穿着，但敦煌的文化却滋养了她们的生活。这些人都是把一生都留在了那里，现在只有一位先生还健在。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保护性的工作。壁画的颜料不断脱落，他们就通过艺术家的画笔将其保留下来。常先生是学油画的，段先生是学国画的，两个不同的画种面对莫高窟的艺术，都做出了了不起的成绩。不仅是艺术上的成就，他们也都是莫高窟的守护神。

解放以后，我们新中国中央政治局将他们全盘接管，改名叫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属文化部管，依然是中央的一个机构。这时候又有一批艺术家、学者来到敦煌，有雕塑、民画、绘画，各个方向的。他们不仅到莫高窟，还赶着牛车到离莫高窟170公里的榆林窟。那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洞窟，跟莫高窟是姊妹窟。他们赶着牛车要去好几天，而且因为带的食物有限，在食物吃完之前就要离开，所以都是到了之后就连夜点灯工作。很辛苦，但是他们非常快乐。

莫高窟的一个特点是风沙很

大。这些艺术家想尽一切办法解决风沙的问题，一方面是清沙，一方面是阻挡莫高窟背后的沙子别继续侵蚀过来。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在戈壁上挖沟，但是没想到一夜之间那些沙子全填满了。再建挡沙墙，也马上被埋了。又在墙角开个洞，用布袋子接着沙子，不让它到处扬。

还有壁画脱落的问题，也让这些艺术家非常心痛。但是当时整个中国都没有壁画修复的专业。常先生在欧洲留过学，他知道欧洲的壁画是很成熟的，于是就想办法从捷克请了专家来做修复壁画的实验。原想请他们多待一段时间，但条件太艰苦了，要喝牛奶、吃面包，哪有？要洗澡，根本没有水。当地的水不能洗澡，洗完以后浑身都痒。

当时常先生找了一个年轻人跟着捷克专家学。但是人家配材料的时候，不让你看。那个年轻人非常有心，他就把那个罐罐保留下来，后来拿到北京（通过分析）知道里面都是什么。就是这样在不断学习、不断改进。这个当年的年轻人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被称为“大国工匠”，依然带着徒弟还在保护、修复的一线。

50年代末，这些文化遗产被下放给地方管理。故宫下放给北京，莫高窟下放给甘肃。但是文化部依然高度重视。从50年代初就有像清华大学的陈明达教授、北大的宿白教授这样的学者专家到莫高窟考察、写报告，最后有了60年代的

加固工程。对莫高窟加固工程做出非常重要贡献的还有清华的梁思成先生，他提出了莫高窟加固工程的基本原则，也是今天我们文化保护原则的雏形。“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这十个字就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我们所有在文物保护上做的事，既要发挥作用，又不能体现出今人的所谓存在，不要改变文物原状，只是延缓它的生命。

在敦煌，我的前三任院长，常先生、段先生、樊先生，他们是同窗，这三位先生及他们的同龄人，几乎都是为艺术献身，有的甚至把一家人献给了艺术。就是因为这样一座伟大的艺术殿堂、文化殿堂，把他们紧紧吸引住了。今天的敦煌研究院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发展为在石窟保护、遗产保护和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的地方，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组织管理文化。

去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研究院考察，主持召开座谈会，肯定“莫高精神”，就是坚守大漠、敢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以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利用莫高窟的文化价值为使命，形成了用匠心呵护遗产、以文化滋养社会的质量文化，也形成了一套质量管理模式，即基于价值完整性的平衡发展质量管理模式。我们所有的工作，保护、研究、传承、弘扬都是基于价值，不断地挖掘价值。当然，保护是第一位的。这样的保护也是一个国际合作，通过这

样的合作不仅引进了其他国家还有其他机构的技术，同时也培养了一批长期扎根敦煌的人。所以人才的培养是国际、国内合作非常重要的一项工程，几代莫高窟的领路人都是非常重视人才培养的。当然，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包括我们香港，也包括日本的友人。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内地企业家也开始加入到这项慈善事业中来。

故宫保护：另一种路径

我们再来说故宫博物院的保护。辛亥革命溥仪皇帝退位之后，故宫马上成立清查委员会，然后开始向人民开放、向公众开放。但等到1923年、1924年的时候，可能溥仪因为曾经要求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就把故宫的文物大量带出宫去变卖、典当，以维持他的生活。太监们也开始偷文物，最后导致了火灾。冯玉祥将军把溥仪赶出紫禁城，然后成立了故宫博物院。1925年故宫被收归国有。一开始就是国家直接管，所以它受到的破坏可以说比较小，否则的话也会像敦煌一样。

故宫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我们把一座禁宫、一个皇权的所在地变成文化的殿堂，变成人民的博物馆，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它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样一个文化殿堂可以激起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崇敬，

而不再是对一个皇家禁地的敬畏。

最能够体现国家力量的是故宫的一个重要事件——文物南迁。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向中国大地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保护故宫的文物。故宫文物南迁体现的也是政府对文化的保护。南迁一路都有军队守护，每一个地方都是政府起主要作用。文物南迁是中华文化保护的壮举。一万九千多箱文物，从头到尾没有丢失一件。可以说，政府是我们文物保护的最重要力量。

进入新千年，从2002年百年大修计划，到后来的平安故宫，都浸入了不同时期的故宫人的开拓创新精神。一代一代的中国人长期守护着这样的文化遗产，才使得今天的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真实的集古代建筑之大成的皇家建筑群，能够看到180多万件文物比较完好地被保存下来，并呈现给世人。

今天我们通过95年的努力，新增了平安故宫、数字故宫、学术故宫、活力故宫，形成了一个事业发展的支撑体系。我们也以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弘扬故宫传统文化为己任，用科技和科学的管理手段对故宫及其中收藏的文物进行科学保护和深入的价值阐释，然后把它呈现给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世界各界的支持。故宫得到的社会支持远远大于敦煌，因为它在首都的中心、中国的中心，承载了五千年

文明，是中华文化的大成。故宫的保护有来自国际、国内的很多伙伴和我们一起，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文化能够在世界界的共同努力下传播出去，让更多的年轻人、孩子们，能够从故宫及其收藏的文物中看到中华艺术传统文化的基因，看到文化自信。我们也希望国际友人能够以他们的视角、他们的文化背景认识故宫，让故宫能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殿堂。

我们透过莫高窟，透过故宫，能够看到不同力量来推动筑就的两座文化丰碑。透过莫高窟，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文化交流形成的这样一种灵动的、不断创新的文化；透过故宫，我们可以看到源源不断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在这样一座殿堂汇聚。在未来的岁月，我们依然需要对它们加以保护、呵护，对它们的价值不断认识，不断尝试为今天的社会发展，为我们今天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做出文化遗产应有的贡献。我们也希望能看到一种不断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命力，看到不断的开放、包容，呈现中华文化的自信。我们也希望，全社会一起守护人类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让这些文化遗产活起来，滋养我们今天的社会，滋养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在一个和谐的世界里共同生活。

【本文根据王旭东在清华文化艺术大讲堂上的主题演讲整理，本刊有删节】